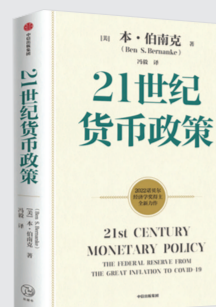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本书全面梳理了从战后早期到现在美联储的运作与演变,解读其需要应对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审视当前的争议,并思考21世纪全球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政策的前景。

《21世纪货币政策》
[美]本·伯南克 著
冯毅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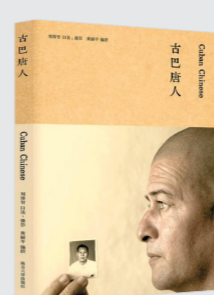
作者通过内证法和外证法相结合的方式,确证《君士坦丁赠礼》绝无可能出自君士坦丁一世之手。本书被认为是近代西方历史文献学的开山之作。

《(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
[意]洛伦佐·瓦拉 著
陈文海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22年7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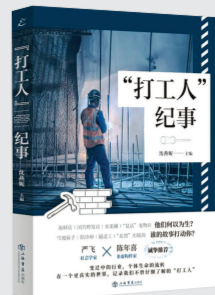
读鲁迅必读《朝花夕拾》。本书主体分为两部分,一是简谱和传述;二是分篇解读,由此把两部分结合成鲁迅的文学个人史。最后,正文外还扼要提及了鲁迅文学个人史上的“失踪者”现象。

《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
吴俊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岛国古巴上竟然有“唐人”,他们究竟是风光一时的“移民”,还是颠沛流离的“遗民”?本书以刘博智先生所摄古巴唐人影像为线索,叙述古巴华侨移民史,记录现存古巴老侨与华裔后代的生存状况。

《古巴唐人》
刘博智 口述、摄影
黄丽平 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跨越80年的行业故事,海鲜店、国营理发店、水果摊、“复活宠物店”、雪地骑手、陪诊师、隧道工……这些普通人书写的打工纪事,情感真挚、文字朴实,道出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打工仔”纪事》
沈熹妮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书人茶话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读唐诗

周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诗无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收诗人2200多位,诗歌48900多首,加上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全唐诗补编》新增的6327首,总量足超5万多首。如此空前繁荣的诗歌宝库,吸引了历代文人阅读唐诗、品鉴唐诗、研究唐诗。古语有云“诗无达诂”,一首诗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解读,人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不同的阐释。

唐诗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应当说,唐诗之中,意境清朗、明白晓畅者居多,但也不乏朦胧幻影、扑朔迷离之作。若论这一类“朦胧派”的诗作,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可谓个中高手。他的诗存世500多首,其中有很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诗,借物言情,如幻如真,最是令人难解其义,又以那首《锦瑟》,堪称唐诗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金人元好问有言:“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玄。”清代王士禛在《论诗绝句》中说得更加直白:“一篇锦瑟解人难。”学者黄天骥先生解读唐诗的新著《唐诗三百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选取32位诗人,摘诗作35首,兼顾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的名篇佳作,自然不能少了李义山的这首《锦瑟》。

倚天有长剑,屠龙需宝刀。为解《锦瑟》,黄天骥用三招拆解这个迷思重重的文字魔方。第一招可称“知人论世”。他从李商隐所处身的时代背景、诗坛风气、生活经历以及情感波折入手,分析《锦瑟》这首诗的创作旨趣和语言技巧。在那个日薄西山颓势初现的晚唐,诗人身陷李党争进退维谷,只能是郁郁寡欢,心事重重。而这首《锦瑟》大约写于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是诗人辞官归隐的暗淡岁月,也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其心情之苍凉悲苦可想而知,整首诗的情感基调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招可谓“交互参证”。黄天骥在戏曲研究领域耕耘数十载造诣颇深,他说:“我在研究剧本时,会使用分析诗词的思路;反之亦然。在研究诗词时,会使用分析剧本的思路,这样交互使用,容易得出新意。”此番面对《锦瑟》,先生巧借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把“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四句化用典故且意蕴深长的诗句,从文字符号转换成视觉影像,以蒙太奇手法剪辑拼接起来,过电影一样盘旋在我们脑中,由此带来愁思茫茫、情有所寄的审美感受。



《唐诗三百年: 诗人及其诗歌创作》
黄天骥 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杜甫十讲》
莫砺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唐人也有“写作参考书”

其实,《唐诗三百年》既可看作黄天骥先生一个人的唐诗选本,也可当成漫步唐诗园地的导读书。读者诸君如对书中某位诗人的诗歌情有独钟,比如对杜甫的诗产生兴趣,可再去找一本莫砺锋教授的《杜甫十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由此登堂入室,一窥堂奥。不过,这都可视为学者眼中的唐诗,如果换一个视角,看看当代诗人眼中的唐诗,又将是别一番风景,比如诗人西川的这本《唐诗的读法》(北京出版社出版)。

全书开篇首句就引用了南宋词人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中的句子:“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表达了对古代文学的一种阅读态度:不必把古人供起来读,应当努力把自己当成古人的同时代人来读。作为现代诗的写作者,西川坦言,他最希望从唐代诗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是“创造的秘密”。比如,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写现代诗这样寻觅灵感?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出现在唐代?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牵引他进入唐诗的世界,一探究竟。

《唐诗的读法》

西川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纵观《全唐诗》,我们不难发现,唐朝文化人赴宴时要写诗,送别时要写诗,游览时要写诗,升官或是贬谪时都会写诗,写诗几乎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他们的灵感从何而来?在无法做到灵感召之即来的情况下,诗人怎么写下第一句?

谜底并不复杂,很快就在查考文献中揭晓。曾在大唐访学的日本学问僧、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山祖师弘法大师(又称空海法师),在《文镜秘府论·南卷》中的“论文意”篇记载:“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原来唐人写诗自有其“作文秘籍”,西川称之为“写作参考书”,彼时唤作“随身卷子”。书中还列举了一种名为《九意》的随身卷子,“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风景。”“春意”条目下有120句,如“云生似盖,雾起似烟,垂松万岁,卧柏千年,罗云出岫,绮雾张天,红桃绣苑……”此外,已知的随身卷子还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等。看来,唐人为了写诗也是蛮拼的,多少日积月累,几多晨读暮诵,才成就锦心绣口,舌绽莲花。据此,西川认为:“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



《有诗自唐来: 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
[美]倪健 著
冯乃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诗自唐来》
倪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掘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

随身卷子也罢,天赋灵感也罢,都是中国诗人写诗之良方。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总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研究和传播中发展壮大。唐朝时就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遣唐使来华学习互鉴,今天更是有许许多多对中华文化抱有好奇心的汉学家,不啻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又一扇品读唐诗的窗口。曾荣获列文森图书奖的《有诗自唐来: 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必读书。

该书作者倪健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博士,师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专攻唐代文学。在他看来,中国古诗研究的一个惯常做法,是根据个别字词的使用来衡量作品的成就。但唐诗不只是吟风弄月或观海听涛,文学属性之外,也是“具备特别物质特性的物体”,有时体现为纸上的墨迹,有时呈现为稍纵即逝的声音,他的目标就是要发掘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包括口头吟诵或书面表达在内的漫长曲折的传播路径。通俗一点说,无论



《有诗自唐来: 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
[美]倪健 著
冯乃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诗自唐来》
倪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诗自唐来》

倪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首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或是在酒馆听人吟唱一首诗,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当这一类文本不同于我们捧读的现代通行版本时,通过比较对照,更能发现一些以往被人们忽视的东西。

20世纪初,敦煌写本的出现,无异于天赐良机。这些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千年的古本,不受后世编辑、印刷过程的干扰,最接近唐代诗歌的本真样貌。倪健的研究犹如私家侦探在分析一件重要的物证,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韦庄《秦妇吟》这八份敦煌写本之上。从抄写者的用笔习惯、涂改情况甚至墨迹的浓淡,到手卷所用纸张的尺寸大小、便携程度以及构成材质,详细对比了不同写本之间的差异和变动,并据此提炼出11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变体,反复推测并验证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尽可能还原出一首唐诗如何在作者、抄写者和读者之间传播的完整过程。

诗的传播过程重要吗?答案是至关重要。因为它常常牵连着诗人的生命轨迹,映照出历史的真相,其意义不容小觑。比如,口头创作一首诗在唐代十分普遍,据统计,《全唐诗》中有81首诗明确标示为“口号”或“口占”,这样的诗诗写于还来不及誊抄到王维的命运。安禄山攻占长安后,王维被俘,他曾尝试服毒并假装失声,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屈服于叛乱政权。安史之乱结束,他遭遇到叛国投敌的指控。但据说,在他被安禄山囚禁于菩提寺期间,友人裴迪来探望,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一桩大事,安禄山强迫梨园弟子在凝碧池为他演奏,乐人们潸然泪下并当众摔毁乐器以示反抗。王维听闻此事感慨良多,当即作诗一首,并大声念给裴迪听,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传递出对圣上的忠诚和对叛军的嘲讽,凭借此诗,足以证明王维曾身陷叛军囹圄而且忠心可鉴。倪健评价这首诗“再现了王维在从裴迪那里听到关于梨园弟子凝碧池故事时自发的道德回应,而他的大声朗诵进一步强调了这首诗是他忠诚的证据。王维不仅为安禄山叛乱下帝国的衰败感到悲哀,更愿意在被囚禁时宣告这种情感”。皇帝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念旧情,将他无罪释放。试想,假若当时裴迪来看望王维时,他没有“口号”这首诗,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诚如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所言:“唐诗中间有丰富的历史,历史也常常借诗歌显现。”唐诗历经千年仍旧熠熠生辉,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读唐诗,就是在读中华文化的历史,这是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段历史。

《古巴唐人》
刘博智 口述、摄影
黄丽平 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打工仔”纪事》
沈熹妮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第三只眼

倪丽娜

以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历史

倪丽娜

历史,作为过去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和现象,是经济学的应用场景之一。经济学说得清楚,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局限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而合约安排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因此,欲了解历史,从合约安排的角度入手,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

《经济学看历史——封建·钱荒·小农经济》一书,便是循着这一理论路径,观照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有趣和重大事件:上古社会为什么贵肉贱鱼、春秋霸主为什么崛起于边陲、统一中国的为什么是秦国、“王莽改制”为什么失败、宋朝为什么鼓励人们喝酒、宋代何以站上古代中国经济高峰、明代漕运为什么没有选择海运、古代中国为什么轻贱商人、“小农经济”缘何延续了两千多年等等。

举例以明。传统中国往往将酒视为不祥之物,小则败事,大则亡国,所以对人们的饮酒行为屡加约束,甚至百出禁令,出台各色“禁酒令”。但宋朝却是一个例外。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朝廷不但禁止人们喝酒,反而想方设法地竭力诱惑百姓喝酒。譬如,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开设在城壕的官办酒肆,当街以歌女招徕顾客,刚从官府借到“青苗钱”(政府经营的小额贷款,乡村户和坊郭户皆可借贷)的百姓,不敢诱惑,大肆饮酒,一顿喝下来,便花掉了贷款的十分之二三。在政府的倡导之下,两宋的酒类消费市场格外繁荣。北宋首都京城内酒楼林立,“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东京梦华录》);南宋行在临安,酒肆遍布,“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雨雪,不少减也”(《武林旧事》)。作者在《“若要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宋朝为什么鼓励人们喝酒?》一文中对此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酒课收入在宋朝财政收入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分析了宋朝酒类专卖的三种制度安排,解释了垄断之下为什么依然有效率,从而为宋廷从酒业中敛取了庞大的财富。

又譬如,传统中国把人分为四类: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且不论,即便在农、工、商三者中,商也排在两者之后,敬陪末座。传统中国为什么将商业贬为末业,把从商的人置于四民之末,施以鄙视的眼光,轻之贱之?作者指出,其实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商业及商人并未为当时的社会和人们所歧视,商人的形象是积极正面的,及至战国才风向突变,商业和商人成了各国打压的目标。那么,这变化因何而起?战国之后的历朝历代为什么要抑商轻商?传统社会的主流答案,或曰商人唯利是图,或曰商人辛劳商人安逸,或曰百姓弃农经商会动摇国本。其实皆言不无理。作者深入分析指出,战国之后历朝历代“抑商”之真正原因,是缘起于商人“流动”的职业特性。因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流动性越强,治理成本越高。要降低整体的社会治理费用,减少从商的人口而提升务农人口是当然的选择。“重农抑商”,理有固然矣。

自然,作者也在序言中指出,以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历史,只是解读历史的一种角度或者说一个维度。但倘若要深入地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这个角度和维度是不可或缺的。

《经济学看历史——封建·钱荒·小农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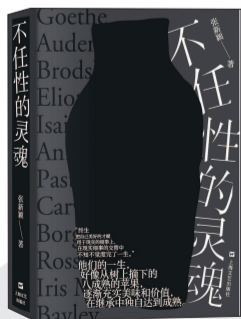
倪丽娜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任性的灵魂》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如果把一个词比作一只捕捉到的兽,那么“任性”这个词,不管是从听觉还是从视觉去推敲,都是一个野兽气息很重、不友善的词。更要命的是,布罗茨基还在“任性”这个词之前加了“不”,这种否定的否定,无疑是会让偷快读到此处的读者感到突兀,眼前突然一阵晕眩,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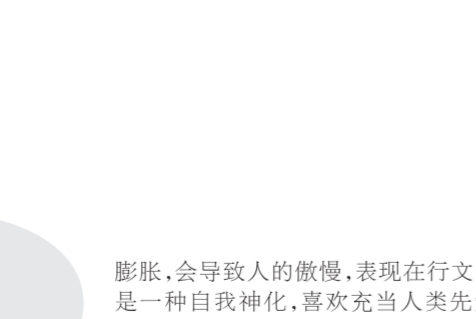
我相信这是布罗茨基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叙述中的变奏,而叙述的变奏是为了某种真理的强调。布罗茨基所说的“不任性的灵魂”,是对奥登写诗的谦逊、语言姿态的赞美。不论是对观念的、语言的、还是情感的,“任性”都会导致一种自我的膨胀与过度,而非克制。而克制,正是奥登的伟大之处。观念的自我

三味书屋



《不任性的灵魂》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六个字本身所含的“否定的否定”的意味就更浓了,眩晕感也更强烈了;它给读者带来一种“任性”就是“不任性”,“不任性”就是“任性”的类似诡辩的暗示。这就好比,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或者“我不是一个杀手”,话语刚一出口,就马上具备了“诗人”或“杀手”的气质,而且越看越像——这就是语言的吊诡。



《这一群不任性的灵魂》
王永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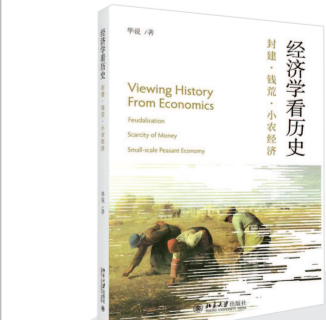
张新颖的《不任性的灵魂》正是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牵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E.B. 怀特等世界文学史上的响亮人物。这一群“不任性的灵魂”,克制、谦逊、中性、平静(后两种特质是以“不任性”为坐标,继续往前推衍得出的),他们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琐事。如歌德,生活上足够富裕,却选择去魏玛宫廷做公务员;如怀特,为《纽约客》专栏写作56年;又如贝理夫妇,尊重婚姻里彼此的“孤独”。孤独,其实是阅读和写作最好的状态,也是生活的真谛所在。

张新颖在文中梳理了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史,其“接龙”的人物顺序依次是徐志摩——卞之琳——吴宓——孙大雨——赵萝蕤——陈梦家——穆旦——夏济安。当然,这不是一条很严谨的上下相扣的人

物链条,其中存在重叠的年代时间。不过,这条闪光的人物链条及其典故,已经让我惊讶不已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新诗研究领域,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众所周知,1945年11月,以赛亚·柏林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有一次历史性的会面。虽然安娜·阿赫玛托娃早年风华绝代,他待在房间的一边,而她在另一边,两人在昏暗的房间里分享了唯一可吃的东西——一盘煮熟的马铃薯,柏林忍住了,不上厕所(怕打扰畅谈的兴致和节奏),畅谈一通宵。这次会面对柏林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世界观。让后来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之后的几次见面,阿赫玛托娃突然对柏林变得冷淡。同样的,我转头一想,这其实也不用太遗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现实与想象之中,合适的时机可能只出现一次,这如禅宗机缘,神佛降临,也如恋爱中的男女突然不再相爱。我们要的任务恰恰好达成,成熟的苹果自然落地。

读张新颖的《不任性的灵魂》,我能



《经济学看历史——封建·钱荒·小农经济》
倪丽娜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